

名人高考也曲折

俞敏洪：英语走5分“麦城”
据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当中，有70%是通过新东方学校走出国门的。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新东方弟子，也许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校长俞敏洪先生，两次高考都是在英语上走了“麦城”。

“第一次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吧，差了5分。于是我回到农村干农活去了。”俞敏洪边干农活边自学，“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进步了，英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又差了5分。”

1980年的第三次高考，奇迹终于发生了，本来只想考地方师范院校的俞敏洪考上北大。回忆坎坷高考路，俞敏洪说：“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区别关键是在面对失败重新去做的能力，还有心理承受的能力。”

郑渊洁：“全国负状元”
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22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郑渊洁当时有个女朋友，女友的父母要求他也去高考，郑渊洁死活不肯，女友因此跟他分手了。“考试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特别怕考试。而且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当了工人。我从小考试就不行，我记不住要考的内容。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参加高考的时候，我跟她讲，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

“分手事件”打击了郑渊洁，他从此发誓绝不参加高考。
郑渊洁的儿子也没有经历过高考。郑渊洁甚至不让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前些年北京某报招聘的时候，儿子郑亚旗开着宝马跑车去应聘，声称：“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

车位就行。”这事在北京的传媒圈传为趣谈。

有趣的是，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我就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张越：被第10志愿录取
在北京55中上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越是个严重偏文科的学生。因为高考数学“进步”到59分，她的数学老师见到她时激动得差点儿从自行车上掉了下来。由于偏科，张越的高考志愿选择有些狭窄，她的理想职业是作家或律师。

1984年的夏天，当张越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几乎晕厥。“我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接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中国政法学校提前调档，而首都师范大学是张越的第10志愿，于是她被提前调档录取了。”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张越就要求退学。教务主任很耐心地对她讲：“这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而且你写了‘服从分配’的。退学可以，但4年内你不得参加高考。”她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上课。

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张越又机缘巧合地成了电视台主持人。最近几年，张越采访了大量农村妇女，尤其关心她们的受教育问题。采访中，她感受到，对于大量的农村青年来说，高考几乎是他们唯一获得未来的路径：“虽然现行的高考制度很不完美，但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贾樟柯：曲线导演梦
贾樟柯如今已是第六代导演中的翘楚，但当年上学时，他学习成绩很差，直到高考前他连解析几何和立

体几何都分不清。他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写诗写过来的。而过度迷恋诗歌却荒废了学业，第一年高考贾樟柯惨烈落榜。

1990年，贾樟柯自费去山西大学念美术，因为那里不用考数学。后来，贾樟柯无意中看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之后，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当上导演。

怎样才能当上导演？贾樟柯到处问人，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还跟他讲千万别考导演系，最难考，“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最后贾樟柯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结果一考就是三年。1993年，贾樟柯终于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水木年华”：高考最“狠”
出身清华大学的二人演唱组合“水木年华”，成员缪杰是北京孩子，而卢庚戌则来自辽宁营口。高考时，他们一个是北大附中的理科第二名，一个是营口的理科状元。

高考的当口儿，父母比他们更紧张。缪杰的父亲每天早上6点准时叫他起来，父子俩一起散步。“第一天考下来，我吓得够呛。我语文成绩是最差的，那天特别闷热，后来还下起了大暴雨。我的心都凉了，晚上一有响动我就失眠。”

“等高考成绩出来，我竟然考了650分，全校第二。”缪杰回忆，后来，他和同学一起去青龙潭玩。“我一高兴，就跳到潭里游泳。当时刮大风，我一下去就呛了口水。心里想，我这650分来得不容易，可不能‘交代’在这里啊。”

缪杰和卢庚戌两人，一路从名牌高中到名牌大学，却用“噩梦”来诠释自己的高考经历：“没有什么比高考更狠的事儿了。从小到大，为了高考这个目标，我们牺牲了多少童年该有的自由与乐趣。”缪杰直到大学毕业后，还经常做这样的梦：“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都还没看呢。一急，就醒了。”

摘自《生活日报》

用美德占据灵魂

王文华

一位哲学家带着他的学生漫游世界归来，个个满腹经纶。在进城之前，哲学家在郊外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下来，对他的学生说：“10年游历，你们都已经饱学之士，现在学业就要结束了，我们上最后一课吧！”

弟子们围着坐下来。哲学家问：“现在我们坐在什么地方？”弟子们答：“旷野里。”哲学家又问：“旷野里长着什

么？”弟子们说：“长满杂草。”

哲学家说：“现在我知道的是如何除掉这些杂草。”弟子们非常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一直在探讨人生奥妙的哲学家，最后一课问的竟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一个弟子首先开口说：“老师，只要有铲子就够了。”其他弟子接着说：“用火烧。”“撒上石灰。”“斩草除根，只

要把根挖出来就行了。”

等弟子们讲完了，哲学家说：“课就上到这里，你们回去，按照各自的方法除去一片杂草。一年后，再来相聚。”一年后，他们都来了，不过原来相聚的地方已不再是杂草丛生，它变成了一片长满谷子的庄稼地。可是哲学家始终没有来。

几十年后，哲学家去世，弟子们在整理他的言论时，私自书写的最后补了一章：要想除掉“野里的杂草，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同样，要想让灵魂无纷扰，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占据它。”

摘自《新疆日报》

剑桥的核心价值

张达明

罗斯·安德森是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教授，此前他发现，越来越多的银行持卡人，在自己未告诉外人密码的情况下，卡里的钱却莫名其妙地从银行账户中被人取走，不仅让持卡人叫苦不迭，连警方也对此束手无策。为了破解其中的玄机，安德森于5年前开始，专门对此进行了潜心研究，最终得出了结论：是芯片与密码技术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漏洞，导致了行骗者在无需知道银行卡密码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钱从银行账户中取走。

为做到防患于未然，作为安德森学生的奥马尔·乔德里，对自己老师的成果做了进一步研究，更加精确地搞清了行骗者作案时如何攻破芯片和密码技术，然后轻而易举地从银行账户中将钱取走的秘密：行骗者采取的手段非常简单，只要在智能卡与银行电脑终端之间插入一个模块，便可以从网上银行取钱。但这种方式却无法在银行自动提款机(ATM)上取钱。

乔德里在征得安德森教授和校方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同意后，将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剑桥大学计算机学术网站上，在全球银行业引起了巨大轰动。许多银行根据这项研究成果，纷纷改进此前的弊端，将智能卡芯片和密码系统广泛使用在信用卡和借记卡上，从源头上遏制了行骗者的阴谋得逞。

然而，刚进入2011年，剑桥大学发展科学委员会突然接到英国银行卡协会主席约翰逊的信函，要求他们将这篇论文从计算机学术网站上撤掉。约翰逊在信函中说：“这篇发表在剑桥大学计算机学术网站上的论文，跨越了合理泄露的界限，过多地展示了芯片和密码系统会如何被攻破的细节，必须坚决将其撤掉。”

剑桥大学发展科学委员会彼得·诺兰立即将信函转交给安德森教授，对他说：“剑桥从未有过屈从于权贵的习惯，这是她的核心价值，但在这个事情上，校方还是要尊重您和您的学生乔德里的意见，是否撤掉论文，请你们定夺。”

安德森教授未假思索地回答道：“您说得完全对，剑桥是不会因为权

贵的施压而轻易屈服，我和我的学生乔德里也是同样的态度。”他当即给英国银行卡协会主席约翰逊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他在回函中说：“这项研究现在已经在公共视野内，乔德里的论文也绝不会从网上消失的！你们似乎认为我们有权力审查学生的论文，仅仅因为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觉得这个对他们‘有所不便’。”这显示了一种对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工作的深深误解。”

安德森教授说：“正如火灾使森林获得新生，一个杰出的大学也使我们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发生了改变。剑桥大学一直是最热的喷火器，牛顿、达尔文都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剑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破坏性机构，那些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都出现在伟大的剑桥。剑桥是牛顿的剑桥，达尔文的剑桥，不是哪一个权贵的剑桥！剑桥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今后也不可能因屈从于权贵而违反她最核心的价值，这是任何人休想办到的！”

英国银行卡协会主席约翰逊在接到安德森教授的回函后，心诚服地对同僚说：“这就是剑桥独一无二的核心价值，也是她800年巍然不倒的精髓所在，我们这次实实在在地领教了。”

摘自《现代青年》

价格上涨，而萨特的这本书正好不多不少是1公斤，可以代替等重的砝码来用。家庭主妇离不开天平和砝码，可这本书的价格比等重的砝码便宜多了。一传十，十传百，家庭主妇们纷纷抢购《存在与虚无》。

这让萨特哭笑不得。但萨特和出版社也因此放弃了修订此书的打算，免得因为此书不再是1公斤而滞销。二战后，这本书拥有了真正的读者，使存在主义成为20世纪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

摘自《羊城晚报》

阴差阳错的畅销书

愿意赔钱出版，并首印了一千册。

当年秋天，这部哲学史上的巨著出版了。让出版社没想到的是，这部著作很快脱销了。萨特又惊喜，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著作会这么快销完。

他委托出版社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时值二战期间，法国制造砝码的原料紧缺，导致砝码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

木子良

2009年年初，苹果总裁乔布斯被查出肝硬化晚期。医生告诉他，必须马上进行肝移植，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乔布斯同意了肝移植手术方案。院方马上为乔布斯在加利福尼亚州肝移植中心进行登记，等待肝源。可院方发现，要进行肝移植的病人很多，如果排到乔布斯至少需要10个月时间。为了尽快挽救乔布斯的生命，院方马上又为乔布斯在其他州进行了登记。这种跨州登记在美国是法律所允许的，目的是争分夺秒地抢时间，尽快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院方发现，几个州最快的是田纳西州，只需要6个星期就可以等到。于是，乔布斯被排到需要肝移植的人中最后一个。

对于急需肝移植的病人，每一秒都显得那么宝贵。

于是，有人找到医院院长杜尔先生，希望杜尔先生行使一下院长的特权，让乔布斯插个队，先给乔布斯移植。

院长杜尔先生听了，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他两手一摊，无奈地耸耸肩，说道：“我哪有这个特权让乔布斯插队？如果让乔布斯先移植了，那么其他病人怎么办？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啊。”

说情的人，只好都郁喜欢地离开了杜尔的办公室。

有人又找到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雷德森，希望布雷德森能帮帮忙，行使一下特权，给院方打个招呼，或写个批条，让乔布斯先移植，否则，乔布斯会有生命危险。

布雷德森听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说道：“我哪有那个特权？打个招呼？批个条？什么意思？我不懂！谁也没有什么特权能让谁先移植，谁可以以后移植。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大家只能按排队秩序来进行。”

说情的人，只好都郁喜欢地离开了州长办公室。

有人对乔布斯悄悄地说道：“看能不能花点儿钱，给有关人员打点打点，

让您先移植？”

乔布斯听了，吃惊地说道：“这怎么行？那不是违法了吗？我的生命和大家的生命是一样的，大家只能按照秩序来排队！”

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乔布斯，包括他自己。那些排在乔布斯前面需要肝移植的病人，有的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老人，还有的是失业者，他们都在按照顺序排队，等待可供移植的肝脏。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宝贵。

6个星期后，乔布斯终于等来了可供移植的肝脏。可是，由于等待时间太长，乔布斯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这次移植，只延长了乔布斯生命2年多些时间。

但是，乔布斯无怨无悔。他在生命最后2年多的时间里，依然为苹果公司开发出更加新颖的苹果产品，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艾萨克森深情地说道：“生命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平等不是口号；平等不是作秀；平等更不是交换；它是生活中最生动、具体的体现。它如明月般皎洁，光可鉴人，散发着圣洁的光芒，它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直抵我们内心的柔软。”

摘自《人物》

回来的几个人才不管这些呢，缺牌的麻将照样打。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一天输一张四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偶尔为之。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公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对坐在床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精都是医用的。

还有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三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口，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书畅销，估计和大家都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填满。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来填补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道青春风景。

摘自《今晚报》

陈寅恪晚年的读书生活

段慧群

1944年，陈寅恪54岁，他的眼睛已无法看清外界了。授课之余，他的读书生活完全是“听书生活”。

1949年，陈寅恪一家来到岭南大学。他遇见了一位意气相投的知音，时年55岁的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沈玉清。这位20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和诗人，总是及时将外间见闻与陈寅恪分享。相似的人生观和文化观让他们的谈论特别欢畅，这让陈寅恪的读书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1952年，陈寅恪非常幸运地遇见了更好的助教，42岁的黄萱。她是一位勤奋且任劳任怨的女子，曾受过多年严格的古文训练。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病中的他请历史系的学生为他到学校图书馆借些弹词小说回来。

在休养的那些日子里，黄萱为他诵读了清代女子陈端生写的《再生缘》。此书令陈寅恪63年的人生感

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后的三四个月间，陈寅恪每分钟都在思考。他在脑海里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让黄萱诵读给他听，有时也会嘱咐黄萱找某句话的出处。在每天上午至中午的固定工作时间内，陈寅恪会把前一晚的谋篇布局口述出来，黄萱的笔飞快地追上他的思绪，6万字的《论再生缘》就这样诞生了。

1956年9月，陈寅恪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选修课。围绕选修课的内容，黄萱助他“读”相关的资料。他上课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陈寅恪虽不能视，然胸中已存万卷书。纯朴的高守真是他喜爱的一位女学生，他建议高守真选写关于“太平公主”的论文；“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

总统住旅馆遭拒之后

刘文丽

1798年秋季的一天，一个55岁的老人到巴尔的摩的一个种植园去调查，在回城市的路上，天色已晚，他打算到一家旅馆开一个房间休息。

因为刚调查归来，他身上还穿着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服，鞋子和裤脚上的污泥还未来得及清理。老板艾尔达见他一身寒酸，不耐烦地说：“房间已经满了，请到别处去吧。”老人听后，无奈地摇摇头走了。

就在老人走后几分钟，一个富商模样的人进来，对老板说：“你怎么把大名鼎鼎的《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打发走了？他可是你这个小宾馆的贵人啊！”富商说话时的表情异常诧异。

“什么？他就是杰斐逊，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老板开始感到惶恐不安，他马上派服务员杰克去找杰斐逊，并嘱咐说，要多少房间都可以安排。

等杰克找到杰斐逊，杰斐逊已经

在不远处另一家旅馆订了房间，他微笑着对杰克说：“请转告老板，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既然没有一个房间可以安置一个普通平民，那么当然也没有一个房间可以安置一个副总统。”

杰斐逊回来后，老板的肠子都要悔青了，他觉得万分对不起杰斐逊。他又亲自去接，但杰斐逊以已经订好房间为由婉言拒绝了。为此，老板接连几日由婉言无尽的自责中。

聪明的杰克摸透了老板的心思，他劝慰老板说：“不如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大房间腾出来，挂上标签：为总统先生预留的房间。不管旅馆多么紧张，不许任何人住。这也算是表达我们对杰斐逊先生的歉疚了。”

老板采纳了杰克的建议，并在旅馆门口的小黑板上，工整地写着：如果只剩下一间空房，那是为总统先生预留的房间。旅客见状，都纷纷前来预订。老板的态度也有了180度大转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都一律热

情接待，周到服务。旅馆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时间到了1800年，杰斐逊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竞选，老板一直想为杰斐逊做点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记者路过艾尔达的旅馆，见到这个牌子很是好奇，便向老板打听其中的缘由，老板依日歉意十足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记者听后感慨不已，第二天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国民报》上发表了题为《总统候选人住旅馆遭拒》的文章，没想到选民被杰斐逊深入人心的平民形象和亲民精神所感动，纷纷把票投给他。最终，杰斐逊一举夺魁，顺利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三任总统。

1802年，杰斐逊总统再次到巴尔的摩视察，特意到艾尔达的旅馆住了一晚，并和他促膝长谈。之后，他们又有多次的书信往来。

杰斐逊去世后，艾尔达为了纪念他，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我和杰斐逊总统的谈话》，讲述了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一个旅馆老板之间发生的故事。书的扉页写道：财富和权力不是人炫耀的资本，唯有平等相待才是人与人之间消除隔阂的根本。

摘自《海外文摘》